



京华学术文库

诗心、文心与士心

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举隅

马自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4034881

I207.22
267

诗心、文心与士心

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举隅

马自力 著



I207.22
267



北航

C171514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心、文心与士心：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举隅/马自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2

(京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5483 - 2

I. ①诗… II. ①马…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②古典
散文 - 古典文学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424 号

· 京华学术文库 ·

诗心、文心与士心

——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举隅

著 者 / 马自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黄 丹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 丹

责任校对 / 张彦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483 - 2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22.75

字 数 / 414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航

C1715144



京華學術文庫

目 录

CONTENTS

诗心篇

清淡的歌吟
——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诗人心态

文心篇

余霞散成绮
——古代散文创作

士心篇

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以职事的考察为中心

引言 / 003

相互认同与历史认同 / 009

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 / 018

风格特征与心理模式 / 060

文学传统与传统再造 / 086

审美心态与艺术精神 / 124

体制与源流 / 149

发轫与勃兴 / 170

徘徊与自觉 / 188

革新与成熟 / 199

复古与衰退 / 211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 225

唐代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 / 238

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 / 246

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 / 263

论中唐“郎官”与文学 / 287

中唐州郡官与贬谪题材文学的兴盛 / 314

中唐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

——中书舍人、学官及入幕研究 / 347

后记 / 359



诗心篇

清淡的歌吟

——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诗人心态

引 言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寒劣，谁谓薄世荣。

这首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幽居》，作于他辞官别秩闲居郊外之时。诗歌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那早春细雨中的诗情画意，达观通脱的人生态度，古雅清淡的气韵风度，构成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士人的心灵图卷。在中国诗史上，这类作品并不乏见，创作这类诗歌的也不乏其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诗论家的心目中，这类作品和诗人已被奉为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或规范。

这些诗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历代诗评诗论中，而且，传统诗论赋予他们的角色评价常常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以他们的始祖和总代表陶渊明而言，从他身后不久的梁代起，就有钟嵘在其《诗品》中追认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到了隋代，又有王通在《文中子中说》中封他为“放人”；宋人徐铉和葛立方更推他为“逸民”、“第一达磨”^①；而在清人吴淇、顾炎武、龚自珍眼里，陶渊明又成了“圣贤之人”、“有志于天下者”、“卧龙豪”^②。又如柳宗元，南宋刘克庄赞扬他复兴“雅道”，是

① 分别见于徐铉《送刁桐庐序》，《徐公文集》卷二十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

② 分别见于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顾炎武《菰中随笔》；龚自珍《杂诗》，《定庵文集》。

“本色诗人”^①，而清人乔亿则指出他长于“哀怨”，为“骚人之苗裔”^②。此外，王维身兼“高人”^③、“卧龙”^④、“神仙侣”^⑤三任，张九龄、孟浩然、常建、储光羲、韦应物、梅尧臣、王士禛等也分别被标上诸多名号。这种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一方面说明上述诗人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诗论家们广泛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则又显示出，他们具有非他人所能够比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致在同一人身上出现了上述诸多看似抵牾难合的角色评价。

尽管如此，这些诗人还是被诗评家们煞费苦心地拈出，在某种审美尺度下被组合成一个凌跨几个朝代的诗人群，并由此对诗歌创作和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其例的，因而其间奥秘便很有深入探究一番的必要。

二

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群，陶渊明等人虽然被诗论家们赋予了形形色色的角色评价，看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一致或趋同的角色特征，而这正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确切地说，是被组合在一起——的外在依据。当然，这些角色特征，是要在与其他众多士林人物的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的。

众所周知，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以光耀千古的抒情长诗《离骚》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处世态度。唐代诗人杜甫，一生追求理想政治，批判黑暗现实，自称“葵霍倾太阳，物性固难夺”^⑥；宋代诗人陆游虽自号放翁，却始终情系“扫胡尘”、“靖国难”，以至到了晚年，仍然“尚思为国戍轮台”^⑦。他们堪称入世型诗人的代表。作为批判现实、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诗人，他们固然或曾行吟泽畔、筑堂花溪、僵卧荒村^⑧；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第226页。

② 乔亿：《剑溪说诗》卷上，《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81页。

③ 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不见高人王右丞。”

④ 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其一：“澄潭昔卧龙。”

⑤ 李日华：《读右丞五言》：“紫禁神仙侣。”

⑥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⑦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⑧ 屈原遭谗被疏，流放江南，行吟泽畔，笑傲沧州；杜甫辞官入蜀，卜居浣花溪，营造草堂；陆游被劾去职，归老故乡，有“僵卧孤村不自哀”（《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诗句。

但他们的行事与心态既不同于佯狂避世的楚狂接舆，又与自号“华阳隐居”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迥然相异。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富有这类诗人特有的浓烈感情外，更不乏政治家忧时悯世的胸襟与怀抱。其角色特征在于“入世”二字。

与入世相对的自然就是出世。在中国封建社会，出世之人除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宗教徒——所谓“出家人”——僧尼和道士外，大量存在的恐怕就是被称为“幽人”、“逸民”的隐士了。从《后汉书》开始，历代史书就专设“逸民列传”或“隐逸列传”、“高逸列传”、“处士列传”、“逸士列传”、“遗逸列传”等记载隐士行事。隐士之所以隐逸出世，其原因各式各样，不一而足。按《后汉书》作者范曄的说法，大致有如下六条：一是“隐居以求其志”，指长沮、桀溺耦耕于田，不以出处进退为事；二是“回避以全其道”，指薛方不仕于王莽新朝，以保全气节；三是“静己以镇其躁”，指逢萌借隐逸以压慑自己的易躁性格；四是“去危以图其安”，指商山四皓去害以全其身；五是“垢俗以动其概”，指申徒狄、鲍焦等离俗绝尘；六是“疵物以激其清”，指梁鸿、严光之流非议世间事物以激扬自己清高的品格。正因为上述缘故，隐士逸民们或甘心畎亩之中，或憔悴江海之上，从而表现了自己“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①的品德，与沽名逐利之徒形成鲜明对照。隐士逸民作为特定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史学家的青睐，代不乏传。至宋，《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发表了总结性的意见，把隐士划分为三种类型：

古之隐士，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怵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赏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

在这里，第一类有德行而不受万乘之聘的隐士和第三类乐山林逃丘园不与世事的隐士比较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所谓“真隐”。比如许由闻尧欲让天下于己而到河边洗耳，以正清听；庞公与其妻躬耕畎亩，不受官禄，后来采药入鹿门山，不

^① 《荀子·修身》。

知所终等。至于第二类，严格地说，不能算作真正的隐士，他们或怀才不遇，或不合流俗，对于出处辞受，完全持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所以，后来的史书隐逸传，就把这一类人排除在外，而专以终身不仕而又有世名当作划分隐士的标准了。总之，隐士的角色特征，在于“出世”二字。

较之入世型诗人屈原、杜甫、陆游等和出世的隐士逸民，以陶渊明为始祖和代表的诗人群自有其独特的角色特征。总的来说，他们与上述两类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与入世型诗人相比较，二者在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方面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把魏阙庙堂当作人生的首选目标。不过，陶渊明等人在出处进退方面远不如屈原、杜甫、陆游等那么执着，他们并没有把魏阙庙堂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或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江海山林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在宦海沉浮与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心理平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江海山林更成为他们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与隐士逸民相比较，二者在追求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方面是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隐士逸民既以此种人生态度处世生存，更以此种处世方式成名立身，因而他们可以被视为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的象征，而陶渊明等人虽然把它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但并不把它当作唯一的生存方式。在出处进退方面，陶渊明等人基本上持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但这并不排除发生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激烈的冲突。这种内心冲突往往在相互对立的两极因素中展开，比如穷通、贵贱、荣枯、悲乐、自由与樊笼、纵浪大化与投身纷纭等。矛盾冲突的结果，是调和出或仕或隐的现实抉择。之所以把它称为调和，是因为对于隐士逸民来说，这种内心冲突原本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至少在他们隐逸山林之前就已经消解；而对陶渊明等人来说，这种冲突却时时伴随着他们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入世还是归隐，都无法摆脱，因而他们吟咏性情、描绘自然的诗歌，便可视为其坎坷不平心路历程的写照。

三

然而，上述角色特征只是陶渊明等人走到一起或被组合在一起的外在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上述角色特征的人恐怕远远不止陶渊明、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柳宗元、梅尧臣、王士禛等几个。看来，要想弄清这个诗人

群形成的原因，还要从其成员的内在要素着眼，做进一步的探寻。

自刘宋时范曄在《后汉书》辟“逸民列传”以来，载写陶渊明行事的《宋书》《南史》《晋书》，无一例外地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也就是说，在陶渊明身后的一两百年内，他主要还是被当作隐士而不是被当作诗人来看待的。即使被视为诗人，也仅仅被推举为隐逸诗人，而且是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在钟嵘的《诗品》中也仅被列入中品，置于潘岳、陆机之下。至于《诗品》之前的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则于陶渊明只字未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陶渊明的风格不符合当时和稍后一些人们的审美标准，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与忽略陶渊明文学成就形成对比的是，陶渊明的人品和风范却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誉。如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物尚孤生，人固介立”，“（陶）畏荣好古，薄身厚志”，“赋诗《归来》，高蹈独善”。梁昭明太子萧统虽自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但对陶诗成就的评价很讲分寸，至于“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却大发感慨。^①《宋书》《南史》《晋书》的陶渊明传，也多从传主人品之高洁方面组织材料，以彰表其“颖脱不羁，任真自得”^②。

陶诗受世人冷落的状况，到了唐代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从初唐始，就有王绩从行事和作诗方面模仿陶渊明；以后，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师承陶渊明；至中唐韦应物、柳宗元，更把陶诗的成就继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品评标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代对陶诗的推崇还不够自觉的话，那么到了宋代以后，这种自觉不但形成了，而且具有了理论的味道。其时，以某种风格统摄、观照陶诗及其追随者诗歌特征的理念产生了。进入明清，随着众多诗论家的品评和阐释，这种诗风的轮廓和内涵渐渐明晰定型，并被广大诗人和诗论家普遍认同。这时，他们的诗作和诗歌风格就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内涵和普遍的美学意义，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现象和文艺美学现象。

这种诗风就是古人津津乐道的清淡诗风。被归纳在这种诗风的旗帜下的，就包括陶渊明、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柳宗元、梅尧臣、王士禛等人。

① 萧统：《陶渊明集序》。

② 《晋书·隐逸传》。

四

可见，这是一个由陶渊明的人品风范——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处世方式——所发起的，以陶诗风格为核心特征和共同审美情趣的诗人群体。当然，陶诗的风格不止清淡一种——不仅有“悠然见南山”式，还有“金刚怒目”式；效法陶渊明及其诗歌的也不仅仅是张九龄、孟浩然等几个人，而且就他们几个来说，其诗风也不能视为只有清淡一种；但是，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清淡诗风的确是中国诗史上生命力最强、涵盖面最广的诗风，而陶渊明等人也的确是这种诗风最有资格的代表。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这个诗人群体可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文人集团：其成员并不共存于一时一世，而是分布在几个历史年代，而且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和一定的社团形式。这一点，与人们熟知的江西诗派等文人集团迥然不同。他们只是存在于一种共同的审美视野和社会心理状态之中，靠一种共同的创作风格以及造就这种创作风格的独特心态维系着，从而达到一种价值认同。

从美学史的角度说，这个诗人群体所造就和代表的诗风，不仅生生不已、绵延不绝，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美学观念的演进和嬗变，还被不断加入新的有机成分，后者通过古人不绝于口的吟赏和品评，终于形成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和规范。

那么，形成这个诗人群体的共同心理基础是什么？清淡诗风的总体特征及其内涵如何？清淡诗风与时代文化特征以及诗人心态的关系怎样？清淡诗风的文化蕴涵和文学传统，清淡诗风的美学意义等问题，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本篇即以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诗人心态为研究对象，把以创作此类风格诗歌的诗人作为一个类型或作家群，通过对几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诗人及其作品的剖析，展示中国古代一类文人的心态、创作风貌以及他们所造就和代表的美学规范，并从文化—审美心态的高度对之加以评判。

相互认同与历史认同

在文学史上，每个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无不有其内在的心理基础，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也不例外。不过，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自然有与众不同之处。一般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除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纲领宗旨外，主要依靠相互认同这一心理基础，或者说只要有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和文学交往，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诗派或诗人群，如建安七子、初唐四杰、江西诗派等。这样的诗派或诗人群，通常是其成员共处于同一个时代，其创作或开一代诗风，或被看作一代诗风的标志。而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成员并不共处于一时一世，也没有某种组织形式、纲领宗旨；他们的创作从未被认为开启了某一代的诗风，或被看作是某代诗风的标志。他们所以构成一个诗人群，成为一种诗风的代表，主要是历史选择或历史认同的结果。如同他们分处于几个不同的时代一样，他们的创作被认为是凌跨时代的，甚至被看作是中国诗歌审美理想的代表或标志。当然，他们自身之间，也有着凌跨时代的相互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是相互认同和历史认同的统一。

一 尊古重史和人格化的历史传统

中华民族是尊古重史的民族，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古”或曰传统，是与祖宗、经验，同时也是与孝悌、规矩相联系的。农业经济的安宁、稳定和周而复始，农产品的自产自销，宗法制度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对于传统崇拜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传统的影子遍及各个领域：思想的传承方面，有所谓的道统；统治术的延续方面，有所谓的政统；权威的接替方面，有所谓的君统。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也离不开文统诗教。

史是古的价值形态，是传统的载体。尊古必然重史，“至圣先师”孔子就说自己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亚圣”孟子则“言必称尧舜”^②，道家极力推崇小国寡民的往古社会，这些都是先王崇拜与传统崇拜的反映。这种尚古心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祖先或先王的人格为崇拜对象，在一种追寻往古和历史的氛围中，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祖先或先王的人格上，从而使这种人格理想成为联系历史和现实的纽带。

这种“史”的传统的影晌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历史工具化，以史为鉴，尊古重史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把握事物盛衰之道；其二是把历史人格化，以史为美，尊古重史是为了法先王、追前贤，推崇某种理想人格以及由这种理想人格所生成化育的一切。这两个方面中，前者主要影响政权的更替，后者主要影响文化的传播。

人格化的历史传统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首先，它依靠的是对某种人格理想的认同；这种人格理想从情趣、观念等方面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对其产生一种奇特的情感共振，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其次，这种人格理想本身又是十分朦胧和含混的；作为理想与形象相结合的产物，这就为人们的阐释留下了相当的空间。可以说，对人格理想的追求造成了尊古重史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氛围，而人格理想本身的意象性、多义性，则造成了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独特机制——以复古为革新，托古以行其道。

总之，尊古与化古，是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重要方面。具体到文学领域，又有所谓学古与通变之说，而这正是构成清淡诗作者们相互认同心理的内在要素。

二 学古与通变

学古与通变，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是个古老的话题。经过文论家们若干世纪的讨论与阐释，清代沈德潜在其《说诗碎语》中发表了总结性的意见：“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积久用力，不求助长，充养既久，变化自生，可以换却凡骨矣。”

① 《论语·述而》。

② 《孟子·滕文公上》。

沈氏同时强调了学古与通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诗不学古，会被视为“野体”，这在尊崇传统的中国显然是难以生存的。但仅仅学古而不知通变，就成为泥古——好比学书法只知临摹，虽纤毫毕肖却毫无自己的神理灵魂。所以，既要保持努力，又不能追求标新立异，如此长久修养，才能达到自生变化、换却凡骨的境界。这样，学古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才是学古的正途。

上述看似纯粹的文学理论问题，却在清淡诗作者的相互认同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构成清淡诗风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

(一)

陶渊明等人是典型的尊崇传统、对往古社会和先民有着浓厚兴趣和感情的一群人。在这方面，陶渊明具有无可争议的代表性。

陶渊明的学古，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活动。他的诗歌，正是这种心理活动的自然流泻。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几次出仕和归隐，无论是出还是处，他的诗中都少不了往古社会的氛围和怀古的情调。在他生命的调色板上，“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是两种相近而不可或缺的底色。从某种角度来说，“遥遥望白云”甚至可以成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理底蕴。当他与邻人朋友来往时是“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二首其二）；当他独处衡门时，是“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时运》），“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萦系于怀悠思难忘呢？且看他的内心独白——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时运》）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这是他对先民任真自得的生活的追思；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这是他对先师遗训的执着；

道丧向千年，今朝斯复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

这是对古道沦丧的叹惋；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

这是对精神偶像的依恋；

愿言躡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

缅怀千载，托契孤游。（《扇上画赞》）

这是对往古社会的追寻。

以上几个方面，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人格化的历史。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先师先民古书古道就是历史的表征，就是他理想寄托之所在。对它们的缅怀和追思，构成了他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它们给他的诗作笼罩上一层往古社会自然淳朴的氛围，赋予抒情主人公以理想人格的基调。这样一来，陶诗就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感，做到了学古与通变的统一。这是深层意义上的学古与通变，人们很难在一般的阅读活动中读出，只能沉潜到作品内部去体会。这是就陶渊明的一般诗作而言；至于他的拟古之作，如《拟古》九首，当然更加具有上述特征。一般的拟古之作，即使不标明所拟对象，人们也很容易找到摹拟的痕迹，从而确定所拟对象。而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却自然浑成，无迹可求。正如明人许学夷所说：“靖节《拟古九首》，略借引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摹拟之迹。”^①清人方东树说得更加明白：“渊明《拟古》，是用古人格作

^①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